

東亞筆談

“筆談”是東亞特殊的語言文字環境、歷史文化傳統之產物，是迄今尚未歸類定性的特殊的文獻體裁，屬於一個亟待開拓的新研究分野。

——王勇

- ◆【論文】“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研究敘說（松原孝俊）···1
- ◆【論文】江戶時代日朝間的漂流、遣返及溝通交流（池內敏）···13
- ◆【書訊】《東亞的筆談研究》···20
- ◆【史料】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目錄（高橋昌彥）···2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組

主編：王勇 責編：朱子昊



“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研究 敘說

[日]九州大學韓國研究中心 松原 孝俊

一、引語

本文以草場珮川所著的《津島日記》為依據，來挖掘江戶時代訪日次數達 12 次的朝鮮通信使與日本人之間進行筆談唱和的真實情況。內容主要探討約定、規定等制約事項中是否存在“舊法”。

“竊以為，那些使者每每到訪，必有筆談唱和。自天和正德年間，筆談唱和逐漸興盛，記錄筆談的材料冊數多達百數十卷。”^①雖然這是一條中所周知記事，但正如上所述，自那時起，朝鮮通信使們的筆談唱和刊本或是寫本便廣為人知。高橋昌彥在他的著作《和韓唱酬・筆語圖書目錄》^②中，作出了現存筆談唱和集的目錄。隨著目錄的完成，我們對於筆談唱和集的一部分也就有了相應的瞭解。以此目錄為起點，每當發現新資料，高橋先生便會將其增收到目錄中。去各地訪書途中偶然見到的異本，也一併收入。我有幸從高橋先生手中獲得了這個目錄的最新版，並將其收入拙作《Global 時代的朝鮮通信使》。^③根據最新消息，可以確認迄今為止約 160 篇（刊本或寫本）筆談唱和集的所在地^④。

(1) 寬永 13 年度----4

(2) 寬永 20 年度----3

(3) 明曆元年度----5

(4) 天和 2 年度----15

(5) 正德元年度----25

^① 《通航一覽》第 108 卷，朝鮮國部第 84、263 頁。

^② 下関女子短期大學紀要 9 號，下関女子短期大學，1990 年。

^③ 花書院，2010 年，第 211-291 頁。

^④ 未將散逸本收錄計數。

- (6) 享保 4 年度——21
- (7) 延享 5 年度——40
- (8) 寶曆 14 年度——43
- (9) 文化 8 年度——9

相關的研究數量雖然未必多，但分析有關筆談唱和的內容這一類，文學上或思想上的研究可以說已經著手在做了。然而，管見所及，這些研究都未涉及下述問題：筆談唱和如何進行的？筆談唱和是否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圍繞筆談唱和，江戶幕府制定的規約是否存在？諸如此類問題。本研究的意圖也就在此。

可再試想一下，對朝鮮通信使一行人來說，每次都有隸屬對馬藩的朝鮮語翻譯或是來自朝鮮國的日語翻譯同行。朝鮮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交流本應沒有什麼不便之處。例如，江戶時代慶長 12 年，第一批約 500 名朝鮮通訊使中，有都訓導 1 名、譯官 6 名、小通事 4 名等（宣祖 40 年 7 月 17 日條）逾 10 名作為日語翻譯的朝鮮人同行。另一方面，朝鮮通信使來日本時，對馬藩也調動了朝鮮語翻譯。例如，據田代和生研究，享保四年（1719）第九次派遣朝鮮通信使時，調動的隨行朝鮮語翻譯有 47 人之多（田代，1991 年，80 頁）。朝鮮通信使來日本時，日方會調動約 50 名翻譯的這種現象，並不只是享保一例，不如說發動人數是遵循慣例的。“通詞之數被相尋候ハハ、通詞下知役と申候而小給人より十人、通詞五十人程被申附置候由承候と、相答可申事。”^①延享 5 年第 10 次通信使來日時有 47 人，寶曆 14 年第 11 次時有 47 人，知道這些後，基本可以說，對馬藩調動的朝鮮語翻譯人數之所以為 47 人，是因為遵守了一種前例主義，從而慣例化了。時常確保 50 名左右的翻譯，在對馬藩看來是必要的，以備朝鮮通信使來日時之需。因此，從這 50 名左右的翻譯中選拔出來，作為領頭的大翻譯們，應當擁有超群的朝鮮語運用能力。

也就是說，我們自然可以由此推出，倘若他們運用朝鮮語（或者日本語）協助朝鮮通信使一行與日本文人們進行交流，兩者之間不會存在障礙。同理也可推出以漢字為媒介的筆談其實並非必要，然而事實上卻有許多筆談集流傳下來，這也正是筆者要在本文研究清楚的課題之一。換言之，就是要弄清以下現象的原因，即：通過隨行翻譯留下的記錄並非日語或朝鮮語，而是不得已之下，試圖使用漢字留下記錄類（筆談等）的材料；或者不得不留下記錄類材料的理由。

^① 宗家記錄《延享信使記錄》第七冊，“八、宿檢分之人並先觸足輕差越候覺書”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從田代，1991 年，64 頁二次引用

還有一個疑問也不應回避。這個疑問就是：既然不是日語也不是朝鮮語，而是憑藉中國話交流是存在可能的，那為何不運用中國話呢？當時，日本列島有以下語言的翻譯：①中國語，②朝鮮語，③阿依努語，④東京語（越南），⑤暹羅語，⑥莫臥兒語等。另一方面，朝鮮國則有：①中國語，②日本語，③女真語（滿洲語），④蒙古語，至少我們可以想像即便是使用中國話也是能夠交流的。然而，縱使荻生徂徠學派佈置了“明古文辭學的修煉與唐音”這一課題；縱使對馬藩的儒者雨森芳洲研習唐音、遊學長崎（第一次在元祿五年（1692），第二次在元祿九年（1696））：

余廿三歲、初學唐話於心越師會下白足惠巖也、廿六歲適長崎授業於上野玄貞、至五十餘年、其間能會音誦與唐人一般者、只看得三人、一曰林道榮、二曰北山壽安、三曰積月潭、今即亡矣^①

即便如引文中描述這般熱心學習，芳洲之師上野玄貞（中文名：國思靖（1661-1713））不過也就是從中國杭州海寧的醫師蔣眉山那裏習得了中國語，也就是南京語。

據若木太一研究，江戶時代住在長崎的“唐通詞”（中文翻譯）們使用的語言有：①南京口，②福州口，③漳州口，④泉州口。^②這些中國方言，應當與駛入長崎港的唐船（中國船）船員的出身地語言相吻合，而這也就造成了以下結果：“深見新右衛門是唐音高手，但因為他只知南音，不知北音，朝鮮的唐音是北音”^③。如上述，操南音（南京口等）的日本人與操北音（北京語等）的朝鮮人之間，通過中文口語交流是十分困難的。即使是在文化度（文化為日本年號），也像草場珮川日記裏記錄的那樣：“初會の日、餘、華音を詠せし後、師の話に、前度は、韓客、邦儒を睥睨して、倭人華音に通ぜず”。^④

由於日朝雙方各執中國話的南音與北音，那麼兩者之間通過“唐話”溝通一事，恐怕難以想像。

因此，本文在再次確認筆談唱和等形式只可能使用漢文之後，也將對另一個問題試作回答，即：只要進行筆談、唱和，日朝雙方應當必須留下記錄。然而，或許因為筆者寡聞，比起日方留存的大量筆談唱和集，朝方幾乎沒有留下相關資料。這種不平衡意味著什麼？有待

^① “音讀要訣抄”，《芳州先生文抄》所收，泉-116頁。

^② 若木太一：“唐話辭書・東京語辭書・朝鮮語辭書”《辭書遊步》九州大學出版會，第3-16頁，2004年。

^③ 《通航一覽》第110卷，第290-291頁。

^④ 《津島日記》下，34B。

後考。

二、筆談唱和中有“舊法”

本文引用的日記體《津島日記》，是佐賀儒者草場珮川（天命 8 年（1788）~慶應 3 年（1867））從文化 8 年（1811）5 月 1 日開始到文化 8 年 7 月 4 日為止的對馬見聞記。^①為了與第 12 次訪日的通信使（文化度朝鮮通信使）進行“易地聘禮”，珮川與其師古賀精里一道進入對馬，不僅觀察了朝鮮通信使一行人的易地聘禮、朝鮮通信使船舶圖、宿舍圖，還以帶插圖日記的方式介紹了大量有關倭館・吏讀等有關朝鮮的資訊。除去上述資訊，在他的日記里，也隨處可見與朝鮮通信使進行筆談唱和的相關記錄。這是我們研究中所關心的，同時也興趣頗深的部分。本文將按照日記中的日期來剖析這些有關朝鮮的介紹。

《津島日記》中，有諸多關於朝鮮通信使和日本人進行筆談唱和的記述。筆者將逐日抽取部分進行探討。

（一）文化 8 年 5 月 12 日條

這一天，石川彥岳（小倉藩校思永館的學頭，1746-1815）的兒子宗吉等人來訪，並對珮川說，他的亡父（這裡是珮川誤記，實為其祖父石川麟洲（1707-1759））在明和度朝鮮通信使來訪時（1764），曾懇請將自己寫的“文翰”呈於通信使過目。麟洲從三年前就開始寫“文翰”，並不斷積累下來，但因病而未能實現將“文翰”呈於通信使的志願，最終帶著慚愧之念離開了人世。珮川在日記中記錄宗吉帶來的“文翰”（石川麟洲與彥岳不明確）時寫道：“在那之後，上述筆語之類的請求最終也沒有被允許”。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石川宗吉的請求是“最終也沒有被允許”，也就意味著有人擁有某種“許可”許可權。

再者，雖說是筆談唱和，但並不是只有日本人和朝鮮通信使直接面對面坐下，互相贈答詩文或文翰的情況。我們也可以推測，也有朝鮮通信使將間接收到的筆談唱和謄寫下來的情況。關於這點，也可以從以下文中判斷出來：“還有同一領地（小倉藩）的醫生，說是要將一首 7 言 200 韻的長律贈予韓客，托我送去，我與淄山（樋口淄山，會津藩的儒者）一起讀了這首長律，最後單單記住了當時的倦意。不

^① 本文中有效利用了附帶影印以及轉寫、解說（長正統執筆）的《津島日記》（西日本文化協會版，上下，昭和 53 年），詳細的雜誌資訊以長正統的解說為準。

久又有一次，在脅阪侯（播磨龍野藩主脅阪安親，1738~1810年）的文學股野嘉善的說，這一回龍野的人賦詩一首，委託我贈予韓客，該詩有800韻。但沒什麼時間傳閱，雖然試圖將詩投贈給這些韓客，但已經沒法實現了。”^①

（二）文化8年6月3日條

此前，朝鮮通信使每每來訪，是如何與蜂擁而至的日本人進行筆談唱和的？這一天，草場珮川留下了下述貴重的記錄，即“關於筆談，以往就有官法”。對於原本沒有頭緒的研究者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筆談のこと、旧来の官法あり、左に録す。前々来聘の節、朝鮮人へ出会、詩文・手跡等を見せ、唱和等相望そろ人も有之そろに付、申上そろ趣且は、仰出されそろ御旨等左に申上そろ^②

舊法究竟是什麼，記錄如下：

宝暦13年（1763）7月9日、信使御用掛、松平左近將監様え左の書付差出、朝鮮人へ出会、詩文・手跡等を見せ、唱和等相望そろ人も有之そろ処、不堪能の人も可有之、又は日本の事績、或は軍書等を真文に直し、摠て御国事に關りそろ義、筆談有之そろても如何敷に付、享保・延享共に右の段申上そろて、御書付を以、被仰せ出そろ、此度も先例の通、被命せ出被下度奉存そろ、依之、延享年御渡被成そろ御書付の写、奉入御覽そろ、以上。宗対馬守内 古川大炊^③

像這樣，首先將不善詩文、手跡的人排除在外，禁止這些人接近朝鮮通信使。再者，也嚴禁將“日本的功績或軍事文書”等翻譯成真文（漢文）。以享保度（1719）・延享度（1748）發佈的書付（江戶時期，傳達將軍、老中命令的公文書）為先例依據，文化度也照此實行了。

但、延享年に御渡なされそろ御書付、宝暦年御達同様の御書付に付、爰に別て書載不仕そろ^④

上述記錄也可佐證前文。

現在雖然找不到那份書付，但是草場珮川沒有理由造假，不如說

^① 《津島日記》上，29A-29B

^② 《津島日記》下，22A

^③ 《津島日記》下，22A-22B

^④ 《津島日記》下，22B

這應是接近真實的情況的。也就是說，我們認為自享保度朝鮮通信使起就已定下了有關筆談唱和的官法這一點，應當沒較大紕漏。

（三）文化8年6月20日條

這一天，珮川將寶曆13年（1763）9月5日松平左近將監的書付抄錄了下來。從這份書付中我們可以得到的資訊是，根據幕府的命令，借對馬藩之手對人物進行了事前審查。

朝鮮人へ致対談度由、儒者医師にかぎらず、願の義、対馬守へ相達そろ者有之そろとも、猥に出会の義不可然そろ、対馬守方にて、得と吟味をとげ、致筆談そろても苦からさる学才の者は、出会せ可被申そろ、又は詩文・手跡等、朝鮮人へ見せ申度由、相願そろ者有之そろとも、可為同然そろ、然しながら学才の不勝そろとも、何ぞ朝鮮人へ相尋度品も有之、対談の義懇望の者は、其人の様子次第、筆談等為致可申そろ、尤京・大坂にをいても、右同様たるへくそろ^①

總歸是以下幾點：

- 1、“儒者医師にかぎらず、願の義”全都要向對馬守申報；
- 2、對馬守要“得と吟味を”；
- 3、進行筆談時，可以讓“苦からさる学才の者”與朝鮮人面談，至於品質高的詩文、手跡等，也可以呈於朝鮮人過目。
- 4、“何ぞ朝鮮人へ相尋度品”者，“様子次第”：根據其人品、風儀、教養等素質來決定是否允許其進行筆談等專案。
- 5、京都或大阪也按此執行。

這樣的規定在明和元年（1764）時也存在，記錄如下：

明和元申年正月16日

一、左の書付松平右近將監被相達候、（自注、16日出る書付也）

朝鮮人へ詩作贈答并筆談等に罷出そろ者、一通りの対話の趣意相認そろ儀、且古来より二義兩説の疑數所杯を談じ、或は風雅を以贈答仕そろ様なる事は不苦候へとも、一分の学力を自負しそろため、其国をなちり、彼国を貴みそろとて我国をあざけりそろ様なる筆談等、第一国体を不辨筋違の様相見そろ、林大学頭にては天和以来弟子ども差出そろ節、詩作贈答はかりにて筆談等は決してしましき段、堅

^① 《津島日記》下、22B-23B

申付来そろ、依之此度出席の者共、右に準し詩作之唱和は格別、国体を心得違の様なる無用の雑事筆談不仕様可相心得そろ、右筆談并詩作唱和の度々、役人其席に立合不洩様取集、林大学頭方へ不残差出そろ筈にそろ、且又筆談の儀相願候者の外給仕等に罷出、又は相願難罷出者ともは、筆談出席の者杯、相願そろて詩文贈答仕来そろ者も有之様相聞、此儀は猶以如何成事にそろ間、相願そろ人数の外は詩作贈答堅仕間敷事そろ^①

亦有附言如下：

右の通相触そろ間、書面の趣に相心得られ、役人附添無油断吟味いたし猥に無之様可被心得そろ、尤筆談并詩作等不洩様取集、林大学頭方へさ出るそろ様可被致そろ

根據上述引文可以明確，戒除“一分の学力を自負しそろため、其国をなちり、彼国を貴みそろとて我国をあざけりそろ様なる筆談等、第一国体を不辨筋違の様相見そろ”^②，然後要求“右筆談并詩作唱和の度々、役人其席に立合不洩様取集、林大学頭方へ不残差出そろ筈にそろ”，他們要將筆談唱和的內容全數交予林家，並接受校閱（或是檢閱）。在此程度上，每當進行詩作、唱和時，還需“役人其席に立合、不漏様取集、林大学頭方へ不残差出そろ筈にそろ”。像上述一般的說法這樣，對馬藩的官員不僅要陪同出席，還要負責監督情況，那麼把筆談唱和理解為是在“自由闊達的氛圍中交換”，只能說是誤解了事實真相。

為何筆談唱和沒有用朝鮮語呢？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因為，當林家進行校閱（或檢閱）時，朝鮮語會對其業務造成障礙。附帶一說，還有記錄如下：

6月22日

林家及遠山監察に筆談の上呈2通共に吾師より封送せられ輯録の事、甚急卒混雜せり^③

我們可以認為，這種日方的自我限制，至遲起源於天和2年（1682）。下面這部分記錄，上述引用文有若干語句上的出入，茲錄如下：

朝鮮人え詩作贈答并筆談等に罷出候者、人通りの対話

^① 《津島日記》下23B—24B，此外，幾乎同樣的一篇文章也可在《通航一覽》第111卷，朝鮮國部，第312頁中找到

^② 《津島日記》下24A

^③ 《津島日記》下、28B

の趣意相認候処、且古来二義兩説之疑敷所などを談、或風雅を以贈答仕候様成事は不苦候得共、一分之学力を自負之為、異国をなじり、彼国（「我国」の誤りか、存疑—引用者）をあざけり候様成筆談等、第一国体不辨并筋違候様相見に付、林大学頭方にては天和以来弟子とも差出候節、詩作贈答計に而筆談等決而仕間敷段堅申付来候、云々（柳營日次記、御願書）^①

結果就是，在文化度朝鮮通信使訪日時，家老大森繁右衛門也做出了下述指示：

一 朝鮮人へ対面詩作贈答并筆談等の義、公儀に相願
そろ人有之、願の通御免なされ候へは其人々対馬守得其そ
ろ様にとの御事以御書附御達有之そろ

右の通留書にて相考申上そろ 以上

8月7日 大森繁右衛門^②

（四）文化8年6月21日條

這一天，有下述記錄：“午時、我師客館に入て筆談あり、余、溜川共に、陪從す。”草場珮川與其師古賀精里及門人溜川一同出席了筆談。“筆談は座敷二の間に於いてす、次の間に属監察出席あり、対州の儒吏も陪坐す”^③

他們遵照規定，對馬藩的儒者也陪同出席，觀察筆談的進行。但是，負責監察的遠山景晉沒多久就退場了，在對馬藩官吏的引導下，古賀精里就席。草場珮川也在隔壁的房間觀察筆談。於是正使與副使就席，古賀精里以「禮」相迎。

我們可以判斷，天和2年的書付中公佈了上述規定，並且，至文化度仍然遵守這種規定。草場珮川所說的“舊法”，就是天和2年、明曆元年的佈告。

三、“入声押韻を許されし”朝鮮文人

《津島日記》文化8年6月21日條中記錄，筆談中，朝方的正使和副使以主次韻的方式作詩贈答，並有：“ただ德望を重する故に、格を破て、これに及ぶ”。

^① 《通航一覽》第110卷，朝鮮國部第86、287頁

^② 《津島日記》下、24B-25A

^③ 《津島日記》下、25B

此處重要的是“破格”，這也就是在指摘脫離規則的漢詩。但時，這裏並未記載具體是哪首漢詩哪個部分的字打破常規，平仄誤用。雖然很遺憾日記中沒能給出具體的提示，但我想到了下述記事：

我東科詩、頗具音調、蓋亦古詩之流、然古詩則通押入聲、科詩則一切不押、豈非陋規且科賦不拘四聲、隨口通押、命曰、嘴韻、無所顧忌、至於增韻、固多好字、如支韻之◆字獅字之類、及其見於經傳之字、本非迂僻、而不敢通押、亦甚無謂、自今主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賦則依例通轉、俾存界限、期還大雅^①

需要注意的是，“奎章全韻凡例”作者李德懋等人的以下記事：“自今主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

倘若追溯研究史，管見所及，最初注意到這條記事的專家是佐藤進。必須高度評價佐藤先生功績的原因是，他指出了：

在《奎章全韻》中，將使用入聲與其他的三聲視為同等的‘四格主義’和“意諳如也”的題目之間存在著極強的關聯性，這一點不應受到懷疑。可以認為，即使放在科場，入聲押韻也是被認可的這種方針，能夠作為科場之外也適用的一個例子。”（佐藤進“作為李朝韻書和漢詩押韻變革文字使用政策的一例”^②

從我們的觀點來整理議論的話，“奎章全韻凡例”提示的是有關朝鮮國科舉詩的變革。“此外，本書的到布從根本上，顛覆了至今實行的三韻主義押韻法。”^③

正如小倉先生所說，可以認為朝鮮的正祖王憑藉禦定的《奎章全韻》，顛覆了“不允許入聲押韻”這種在中國或日本通行的漢詩作法原則。

若是這樣，今後，至少在讀解文化度朝鮮通信使唱和集時，必須將佐藤進的卓見放在心上，來觀察兩國文人的唱和。這是因為兩國文人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考慮到對方的立場，彼此避免明示這種打破常規的漢詩。儘管如此，我想提出的假說是保持這種“不一致”的漢詩作法是上述的理由。

為了證明這點：

初会の日、余、華音を詠せし後、師の話に前度は韓客、

^① “奎章全韻凡例”，《雅亭遺稿》第5卷，第28張A-B。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只是，這條記事並未收錄在《奎章全韻》現行本（拙藏）中。

^②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卷—3號，1984年，第631—644頁。

^③ 小倉進平：《朝鮮語學史》，刀江書院，1964年，第524—525頁。

邦儒を睥睨して、倭人華音に通ぜず、詩韻調律に不諧はな
どど誇り、その国音を華に同じように誑き誇れるゆへ、汝
に一詠を命せしなり、此たびは得て誑き誇ることはあるま
しきぞ、と云て一哂せらる^①

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也可以通過上述說明得到體諒。

四、朝鮮通信使的“我邦学風の正きに帰せしことを賞嘆せり”論

韓國方面提及朝鮮通信使，會說他們是日朝兩國“和平友好的象
徵”，或是持“小中華論”^②，認為是通信使將朝鮮的先進文化傳入日
本。日本方面也有不少人不加批判便囫圇吞棗，甚至還在此基礎上誇
張了不少。並不馬虎迎合這種傾向，正如夫馬進提到的：

在當時，朝鮮、日本、中國各自的文化學術位相如何，
有無嘗試著去丈量這些位相變化；或是有無嘗試著去弄清由
兩使節（引用者注：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帶來的異國學術
情報在首爾方面看來有著怎樣的交叉。做到這種程度的基本
沒有。^③

还有一个问题，例如宋学，也就是朱子学传播到日本，
或是像在有关日本、朝鲜朱子学者交流的研究中发现的那样，
凡是说道通信使，就只是一味强调其肩负着传播朝鲜文化到
日本这一任务。^④

若要在夫馬進的驥尾再稍作附著，言及於此，便有以下幾點。
首先需要注目的就是草場珮川的日記：

以前は、彼より堀川護園の学風を破して、本邦の諸儒
往々朱子正大の学術に由ずして、邪路に迷へるは、可憫む
ことなりと、所謂李退溪・鄭栗谷（李珥<1536年-1584年>
の誤りか。李珥は、号は栗谷、字は叔献、徳水人）などを
盾にして、毎々我れを攻撃せしこと、諸筆談集に見えたり、
このたびは吾師、大学纂积等の著述もありて、我邦学風の
正きに帰せしことを賞嘆せり、最後に彼より我に贈りし冗

^① 《津島日記》下、34B

^② 韓國高中國定教科書《國史》2002年版等許多書中。

^③ 夫馬進：“通過朝鮮通信使認識的日本古學”，《思想》981號，2006年1月號，第4頁。

^④ 夫馬進，同上，第4頁

長なる書牘あり、その中に陸学を混用せし説あり。吾師此説は、為に蔵拙すべきとのことゆへ、筆談中には脱し置ぬ^①

這些朝鮮通信使尊崇著如同金科玉律般的朱子學，甚至猛烈“攻擊”日方學派，竟然“我邦学風の正きに帰せしことを賞嘆せり”。在這個語境裏，可以從“以前は彼より堀川・護園の学風を破して本邦の諸儒往々朱子正大の學術に由ずして邪路に迷へるは可憫ことなりと”（第 142 片）這一部分中判斷出，“我邦学風”就是指“堀川（伊藤古義堂）、護園（荻生徂徠）”。如果換一種觀點，假設這裏的學風指的不是“堀川（伊藤古義堂）、護園（荻生徂徠）”，在文意上，就與朱子學一邊倒的朝鮮通信使“正きに帰せしことを賞嘆せり”不一致了。此外還有朝鮮通信使贈予草場珮川的“混用した書牘”。這畢竟是草場珮川寫的日記，因此或許存在“自我偏袒”的部分，也就是說必須對他的話打個折扣。

不怕有錯地說，文化度朝鮮通信使中的一部分人，不僅可以理解在朝鮮長期被當做“異端之學”的王陽明、陸象山學說，還可以理解日本的古學派或徂徠學派等的書籍。我們自然可以認為，這一部分人已經注意到，他們無法無視中國思想界的新動向。^②

五、代結語—與朝鮮通信使的筆談唱和

本文的目的在於回答“與朝鮮通信使進行筆談唱和是否有法約束”這一問題，至此答案應該已經明瞭。誰都可以預料，與朝鮮通信使自由、輕鬆地享受筆談唱和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若要進行筆談唱和，還需要進行事前申請；審查申請者的教養水準；事前檢閱；會審；核實筆談唱和的話題等。在此之上，事後還需要由林家校閱（或檢閱）筆談唱和的內容，只要是幕府設想到的限制方法，都要加諸實施。換言之，在“五花大綁”之中，我們會聯想到這樣的光景：伴隨著監視的筆談唱和。這麼一說，許多人或許就會有這樣的疑問：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遺憾的是，根據現存資料，無法給出正確解答。但我們可以認為，至遲在享保度（1719 年），“筆談唱和之法”已經付諸實施了。

雖然還很多遺留問題，但礙於篇幅限制，詳細的考察就有待日後繼續了。僅對以下幾點作出期望。

^① 《津島日記》

^②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和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大學出版會，第 699 頁，2015 年。

其一：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集，雖然是日本人與朝鮮人通信使的對談記錄集，但一方面，也證明了，再怎麼想在筆談中說，也無法互相談論，只得按照規定不說。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朝鮮文人想要談論的“朱子學尊崇”是朝鮮國國法一直主張的，不受日本的陽明學者、古意堂學派或萱園學派等雜音的困惑。只是，在朝鮮國究竟是否這樣要求，目前還不明確。

其二：朝鮮通信使唱和集是文人社團集。例如，《七家唱和集》（10卷10冊）是木下順庵門下室鳩巢、祇園南海等7人的唱和集；《問槎畸賞》（3卷3冊）是荻生徂徠門下夷之唱和集。有上述佐證，也就不能不假思索便對文人社團集這一想法付之一笑了。

其三：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集是以提升漢學者或文人的聲譽、做官、粹集門人為目的編集而成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假設在當時，因為沒有卓越的漢學者或是詩人這種全國級別的評價者，從而導入了來自外國的朝鮮通信使這一標準。與他們進行筆談唱和而產生的筆談唱和集，就成了已經得到他們認定的證明。但是因此就認定根據筆談唱和集的刊行，就能知曉某個地域存在有名有實的漢學者或詩人，可能就有些臆測成分了。正如管宗次指出的那樣，與朝鮮通信使的筆談唱和：“無外乎是一個披露的場所。也能夠體驗自己的本事或是平素學問的精進情況究竟如何。”^①又有鈴木健一一語道破：“對於日本詩人們來說，與通信使進行贈答，不僅可以在實用技巧層面上測試自己的實力，還可以在處世層面上收穫名聲。日本詩人們抓住了這兩方面，使得贈答成為一座通往一流詩人的階梯。他們（日本詩人們）就像在說這是只此一次的機會一般，幹勁十足、氣勢洶洶地湧來。”^②

其四：對朝鮮人來說，朝鮮人通信使與日本人之間交談的筆談唱和也有這種情況：是即使想說也不能說，最終閉口不言的證明。

（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 陳齡之 譯）

^① “圍繞朝鮮通信使文藝資料（新出）”，《日本文化學報》15號，2002年第173頁。

^② 鈴木健一：“李東郭詩二題”，《日本思想史》49號，1996年，第4頁

江戶時代日朝間的漂流、遣返 及沟通交流

[日] 名古屋大學 池內 敏

一、近世東亞海域的漂流民遣返制度

研究表明，在近世東亞地區，中國（清）、朝鮮、日本及琉球之間成立並推行著漂流民的互相無償遣返制度。

清康熙 23 年（1684），以漂流到朝鮮的山東省民遣返為契機，中國向各朝貢國國王下達遣返中國漂流民的指示。乾隆 2 年（1737）清朝制定了漂流到中國的外國人遣返制度。乾隆 4 年，漂流到海寧的朝鮮漁民通過陸路得以遣返，這成為以後救恤漂流到中國的朝鮮漁民的先例。講到與日本相關的內容，首先，漂流到日本的中國人從漂著地被送到長崎，漂流到中國大陸沿岸及周邊海域的日本人會被送到乍浦。其次，遣返最終通過連接長崎（日本）和乍浦（清朝）得以實現，而兩港又通過進行對日貿易的中國船隻連接起來的。1644 年到 1868 年的 220 餘年間，從中國遣返日本漂流民達到 64 次（春名徹 1995）。

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導致日朝一度斷交，但朝鮮和日本之間的漂流民遣返制度還在繼續實行。而兩國間互相無償遣返制度的實施大概是以 17 世紀 40 年代為起點。1599 年至 1872 年的 270 餘年，從日本遣返朝鮮漂流民達 970 餘次（總計超過了 9700 人），1618~1872 年從朝鮮遣返日本漂流民達 90 餘次（總計超過了 1200 人）。漂流到日本的朝鮮人首先從漂著地被送到長崎，再從長崎經對馬遣返回朝鮮。相對應的，漂流到朝鮮的日本人首先從漂著地被送到釜山的倭館，然後在從倭館遣返到對馬官廳。之後按照祖籍的不同，分別委託長崎奉行或大阪町奉行進行管理。

漂流到琉球的朝鮮人遣返的最早記錄是 1661 年。從 1661 年到 1669 年僅有三次是經過薩摩、長崎由對馬藩負責遣返的。1697 年以後均是

通過清朝進行遣返的。其過程是，乘船從琉球到達福建，再通過陸路送到北京，在北京將其交給朝鮮方面。

從 17 世紀初延續到 17 世紀 80 年代的明清鼎革導致的劇烈動盪平息後，東亞地區形成了穩定的地區秩序。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漂流民的互相無償遣返制度才得以在東亞地區開始實行。相對應的，這種遣返的不斷進行也有助於東亞地區的秩序穩定。

4 年（1784）3 月，一名對馬藩士非常擔心朝鮮漂流民在長崎奉行所的待遇，說到：“與彼國（朝鮮）建立和平邦交到現在，能夠體現雙方誠信的是對漂流民的認真處理和及時遣返。百餘年間，這件事一直在順利進行。”文政 2 年（1819）7 月，搭載 25 人的薩摩船漂流到朝鮮半島西部，當地的官員庇仁縣監尹永圭首先表明自己的態度：“貴國與我國已經建立了友好關係，貴國船隻遭遇海難，我國豈能坐視不管？”（池內敏 2009）。明和 4 年（1767 年）漂流到鳥取藩領的朝鮮人，與當地日本人進行筆談十分困難，但是僅憑“朝鮮、長崎”兩個單詞就與當地的日本人進行了簡單的溝通。天明 4 年（1784），24 名朝鮮人漂流到長門國，其中的一部分人想自行前往長崎，並因此與日本方面的官員發生了衝突，但是漂流民的這種反常行為後來得到證實是出於“只要到達長崎就可以回到朝鮮”的想法（池內敏 1998）。從上述事例可以得知以下兩點。一是，日朝兩國的統治階層都認識到，漂流民的互相無償遣返與日朝關係的穩定密切相關。二是，經由長崎可以遣送回祖國的遣返制度的規則性應用已經深入到兩國的民眾層面。

二、語言的障礙

在日本，除長州藩等藩之外，各地都沒有配備外語翻譯（朝鮮語翻譯等），也沒有派遣翻譯到漂著地，漂著地方面也沒有申請派遣翻譯的事例。長崎配有中文、朝鮮語等翻譯，加之漂流民的遣返已經制度化，因此漂流民只要從漂著地到達長崎就可以自動進入遣送回國的程式。這也同樣適用於漂流到中國的日本人，只要從大陸各地送往長江河口的乍浦就可以被遣送回國，由於乍浦聚集居住了很多進行對日貿易的商人，可以無障礙地用日語進行交流。在朝鮮，漢城（漢陽、首爾）、釜山等地配有國家專門培養的日語翻譯（倭學譯官），若在沒有配置日語翻譯的地點發生漂流事件，朝鮮會派遣附近的翻譯去聽取情況。在漂著日本人的相關記錄中屢次出現譯官到達後感到心安的記載，但也不及到達釜山後的安全感。其原因是，在釜山浦設有對馬藩的駐外機構倭館，對馬藩的日本人常駐倭館（但是，漂流到朝鮮的日本人是不允許進入倭館）。

因此，在到達長崎、乍浦、釜山之前，特別是在漂著地地溝通交流並非易事。漂流到日本的中國人留下了不少漢文書寫的筆談記錄，據此可以得知在從漂著地到長崎的移送途中進行了漢文地對話和漢詩贈答。但是，漂流到日本的朝鮮人大多數為漁民，幾乎不可能進行筆談。另外，經常可以看到漂流到海外的日本人，在最初見到的人面前書寫“日本”這一詞語，但並非所有日本人都通曉漢字、漢文。可以運用漢文進行交流的日本人漂流到海外的事例並不多。

現有史料表明，發生過朝鮮人漂流事件的日本地區，在收集朝鮮語詞匯。另外，也有記錄表明漂流到日本的越南人在記錄日語單詞（金永鍵 1943）。還有漂流到巴丹半島的船隻神力丸上的日本人摘記當地詞語的記錄（倉地克直 2005）。例如，越南人把“一、二、三、…、十”“筆、紙、錢文”“水、飲茶、飲酒”“貓、蚊、蠅”“暑、寒”等 57 個詞語用漢字表記的越南語發音記錄下來。但馬出石領的日本人用片假名記載了漂流到當地的朝鮮人經常使用的，例如“湯勺シュッカラ^①”“煙草 タンバヲ^②”等 50 個以上單詞的朝鮮語發音。收錄的單詞大多是關於數字及隨身物品的，這種對外語單詞的收錄行為與其說是對異國文化樸素的好奇心，不如說是想要更順暢地進行交流的誠懇願望的表現。

其結果是，這種片段式的語言交流和肢體動作及想像力極大地制約了彼此的溝通交流，加之兩者處在不能進行順暢溝通的環境中，因此漂流民和漂著地的人們的互相關係大多僅限於“觀察-被觀察”的關係。

漂流民們首先從漂著的海邊被移送到領主的城下町等，收進領主設定的住所。在江戶和長崎的對馬藩宅邸設有宿所，對馬官廳中設有固定的設施“漂民屋”。在宿所周圍設有看守，漂流民大多在行動上會受到限制。寶曆 13 年（1763），在長崎，本應收進對馬藩長崎宅邸“朝鮮人小屋”中的漂流民在“市區內隨意徘徊”。（對馬藩政資料《漂民考》，長崎縣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也有日本人目擊到，朝鮮漂流民在長崎市內“獨步”，在魚町及出島蘭館的橋邊佇立。並且不止“獨步”，還進入日本人家裡，還有傳聞說“他們搗米，砍柴，像日工一樣勞動”。

雖然年代未詳，但從用地的形狀和增改建的時期可以推斷，對馬藩長崎藩邸用地內增設朝鮮人小屋的平面圖製作於天明 7 年（1787）到天保 9 年（1838）之間。在大門和圍牆附近有用紅筆描畫的更改指示。根據這些指示，小屋的增設可以使“朝鮮人不能簡單地隨意外出，外面的

^① 韓語為술가락，羅馬字標記為 Sutgarak。譯者注

^② 韓語為담배，羅馬字標記為 Tambae。譯者注

人也不能觀看（朝鮮人），... 管理更加嚴格”，從而達到一舉兩得的目的。反過來考慮，這說明在增建朝鮮人小屋之前，朝鮮漂流民很容易溜出用地在市區徘徊，長崎人也經常會來對馬藩宅邸越過圍牆觀看朝鮮人。安政 2 年（1855）到訪長崎的荷蘭國網侍從長 Li jnden 伯爵（1808-1864），描繪了對岸的對馬藩宅邸的朝鮮小屋旁邊，佇立在河口沿岸爬樹、垂釣的 9 名朝鮮人。他們身著白色服裝，梳著朝鮮民眾典型的髮型，無所事事的樣子，反映了等待歸國的漂流民的心情（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2013）。

三、可以直接對話的人們

近世東亞三國間，漂流民和漂著地居民雙方都具備漢文運用能力時，可以進行“直接”交流。所謂“直接”並非是進行對話，也並非是利用母語，也不能夠保證百分百的溝通與理解。即便如此，這也是比“觀察-被觀察”關係更深一步交流的稀有事例。

文政 2 年（1819），漂流到朝鮮半島西海岸的 25 名薩摩國人中包含了 3 名武士。其中安田喜藤太義方獨自一人承擔了從漂著的 7 月 3 日開始到回到釜山之間的所有必要的筆談。從朝鮮人和日本人的交流這一點來看，直到 7 月 25 日離開漂著地的三周之內，安田與以忠清道庇仁縣監、馬梁鎮倉使、忠清道水營執事官為代表的當地官員及部下進行了詩文贈答，留下了豐富的筆談資料（池內敏 2009）。特別是不僅與庇仁縣監進行了漢詩文贈答，還論及日本繪畫、嗜好品（泡盛酒、煙草）以及日本和朝鮮的諸多制度比較等內容。在離開漂著地之前，安田等 3 名薩摩武士吟詠並贈送了和歌，庇仁縣監讚美了長條詩箋上優美的草書體，並稱從他們朗讀和歌的聲音中感到了餘韻。安田具有極強的好奇心，他的漂流記也非常有趣。安田與下級官僚品煙品酒，談天論地。其記錄中隨處可見朝鮮官僚對於遭遇海難事故到達異鄉的人粗獷卻溫暖親切的關懷。10 餘年後，安田再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漂流到中國大陸，消失於寧波的海面，但是從當時的記錄中看不到筆談交流的情況。交流的內容因“漂流記”的存在而變得明確立體。近世日朝間漂流的漂流記，與漂流次數相比，數量極少，因此交流的真實性無法考證而被埋沒。

翻譯可以比較自由地進行交流。翻譯不但自己進行交流溝通，還充當使用日語和朝鮮語人相互交流的媒介。連接不懂日語的朝鮮漂流民和日本官吏間的也是朝鮮語翻譯。其能力存在個人差異，因此交流的品質也會產生差異。近世後期的對馬藩朝鮮語翻譯小田幾五郎，可以說不僅僅是語言的橋樑，還是一名深入理解朝鮮（人）和朝鮮文化的著名翻譯。

他留下了幾本關於異文化理解的著作，例如《象胥紀聞》中寫到“濟州島的朝鮮人漂流到日本，堅決不會告訴別人自己的身份，詐稱自己來自全羅道南部”。漂流的濟州島民虛報出身地這一歷史事實，已經得到當代的歷史學研究的證實（池內敏 1998），但是在江戶時代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一點。這不是僅通過善於運用朝鮮語就能明確的事實，而是只有像小田那樣對朝鮮（人）具備深刻理解的人才可以發現。

四、交流溝通與翻譯

溝通所必要的語言能力根據場景要求的溝通標準有所變化，因此對語言能力的評價也會隨著需要的溝通標準發生變化。並且交流本身，在語言能力缺乏的狀態下並非不可能。這節中引用一個寶曆 14 年（1764）朝鮮通信使的例子，分析當時的溝通交流情況。

從事官書記金仁謙，於 1764 年 2 月 1 日，去江戶途中，從彥根向大垣行進的山道中遭遇大雨，在山中迎來了黃昏。周圍漆黑一片看不到其他通信使行員的身影。日本轎夫意志消沉，卸下轎子坐著不動。“完全依賴語言不通的倭人，但倭人卻坐著不動”，在此狀態下，金仁謙感到非常不安和危險，他“抓著倭人的衣服，傳達自己焦躁的心情，拿出轎中的食物分給倭人”。轎夫非常高興，吃完食物，再次抬著轎子前進（【事例 1】）

上述事例的前一日（1 月 30 日），從大津到彥根的行列中，正使書記成大中乘坐的轎子比副使書記元重舉的轎子進度稍慢。希望與成大中的轎子一同行進的元重舉，向自己轎子附近的日本人打招呼。才五郎低下頭，合掌答道“是”。之後，元重舉指著後面成大中的轎子說“轎子，快！快！”，指著自己的轎子說“轎子，慢！慢！”。二人的轎子得以並肩行進，元重舉說“好！好！”，兩人的日本轎夫都大笑不止。（【事例 2】）

更早之前，正月 2 日，通信使乘船從赤間關（下關）行進到室積。元重舉對照以前的使行錄對陸地方向的峽灣與日本船夫進行一一確認。船夫中有“能解文字”者，搖頭擺手回答他對浦名的確認（【事例 3】）。

【事例 1】是不用語言通過肢體動作進行的交流。【事例 2】是根據聽到的一星半點的外語詞句，在特定情境下進行的交流。【事例 3】是信使將“新泊浦、丸尾崎、德山、三田尻、笠戶”等一系列地名列舉出來，與眼前風景進行比對，船夫以自己積累的地理知識為背景進行回答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發問和應答都是詞語，也可能是寫下來的字句。因此，這幾個事例都是通過單詞和字句進行的有限的交流，並不是

能夠隨時隨地理解任何提問，大概也不可能理解吧。

制述官南玉認為“不僅我國的譯學、翻譯不能理解，連大部分對馬人也理解不了大阪以西、西京和江戶等地區的語言。與其通過翻譯不如通過筆談更能詳細溝通”。在倭學譯官的日語能力不是很高的背景下，南玉指出了日語巨大的地區差異（方言）。連對馬的日本人都不能理解，朝鮮王朝的倭學譯官不能理解也是情理之中。南玉甚至認為筆談的方法更好。

當然，這並不是南玉認為日本的朝鮮語翻譯比較優秀，而是他對對馬藩的朝鮮語翻譯的能力產生了懷疑。根據南玉的敘述，“癸未信使隨行的對馬藩朝鮮語翻譯有大概 50 名，多數都語言不通。特別是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去江戶，即使發問也沒有回應”。翻譯中有個叫松本善左衛門的人很特別，據說只有這個人與另外 4 個翻譯曾經跟隨延享度通信使（1748 年）前往江戶。南玉評價對馬藩的朝鮮語翻譯為“多未通語”。將多數翻譯與松本做對比，應該不是在說單純的語言能力。是否像松本一樣，具有跟隨信使進入江戶的經驗，具備應對通信使的任意提問的知識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寶曆度通信使結束在江戶的聘禮踏上歸途，於寶曆 14 年（1764）4 月 5 日到達大阪。7 日凌晨發生了都訓導崔天宗被殺害一事（崔天宗殺害事件）。崔天宗的遺體於 11 日入棺，13 日放置到大阪市內的竹林寺內。其間，有關此事的所有資訊，例如犯人是對馬藩朝鮮語翻譯鈴木傳藏，殺人後從大阪逃走等資訊，都沒有通知朝鮮。鈴木傳藏於 4 月 18 日被逮捕一事也沒有告知朝鮮方面。信使方面得到對馬藩的正式通知是在 20 日以後（池內敏 1999）。

我們可以在趙曦的《海槎日記》等使行錄中看到 4 月 20 日的日朝間對話，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口頭對話。但是，對馬藩方面的史料在記載此次對談時寫到：“上述口頭對話，應對內容較多，上上官的日語不好，若有說錯或說漏的地方就會產生問題，因此也用漢文記錄下其內容”。僅依靠倭學譯官的日語能力，對馬藩還存在顧慮，因此將相同內容用漢文記錄後再提交，以補充對話內容。從這點可以看出，譯官的翻譯活動，並不是僅通過日語會話進行的，也結合漢文進行。筆談，不僅是在詩文贈答時，在比詩文贈答更加枯燥無味的政治談判和事務聯絡的場合也發揮著作用。

小結

1471 年刊行的申淑舟《海東諸國記》中記載的對馬島內地名，是

把日語的發音轉換成漢字音的記錄（李根雨 2015）。例如，船越（ふなこし）為“訓羅串^①”，西泊（にしとどまり）為“尼神都麻裏”。李根雨並沒有指出，這些不是筆談的記錄，而是將日本人口頭告知的地名寫下。與此相同，1696年漂著到蝦夷地的朝鮮人李志恒的漂流記《漂海錄》中，將蝦夷地的和人地松前（まつまえ）一詞用朝鮮文字記錄了下來。申叔舟、李志恒的例子中，並非本人不能筆談，大概是告知地名的日本人缺乏筆談能力吧。上述【事例3】中，“舟循左陸為路、新泊浦、丸尾崎、徳山、三田尻、笠戸等之處、皆憑前聞而問之、倭沙工能解文字、點頭搖手以相可否”（《乘槎錄》甲申正月2日條）。此時，可以確認日本的地名是通過日本人的漢字表記記錄了下來。

另外，當時的“筆談”中還包含以下事例。其伴隨著十分豐富的想像力，超越了現在印象中的“筆談”。甲申2月4日，信使行列在從鳴海出發向岡崎行進時，元重舉因為去廁所耽誤了行程。當他從廁所出來之後，看不到任何行列的影子，只有元重舉應該乘坐的轎子，但卻沒有轎夫的身影。過了很長時間，日本官員終於出現，元重舉在那人的手掌中用手指寫漢字進行了短暫的筆談。這些類似的事例也出現在漂流到朝鮮半島的薩摩藩士安田義方的日記中。

参考文献

- 池内敏(1998)『近世日本と朝鮮漂流民』臨川書店
(1999)『「唐人殺し」の世界』臨川書店
(2009)『薩摩藩士朝鮮漂流日記』講談社選書メチエ
(2011)「癸未信使の通訳たち・ノート」『東アジア文化研究』49(漢陽大・ソウル)
(2014)「漂流と送還」『岩波講座日本歴史』20〈地域論〉
金永鍵(1943)『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関係』富山房
倉地克直(2005)『漂流記録と漂流体験』思文閣出版
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2013)『対馬藩と朝鮮通信使』重要文化財指定記念特別展図録
春名徹(1995)「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漂流民送還制度の展開」『調布日本文化』
李根雨(2015)「『海東諸国記』の地理情報と李芸」、韓日関係史学会第161回月例会報告

（名古屋大學 程永超 譯）

^①韩语为훈라곶, 罗马字表记为Hullagot。译者注

書訊： 《東亞的筆談研究》

本书由首席专家王勇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刊行，2015年12月重印。

全书28万字，分为“东亚笔谈”、“中日笔谈”、“中朝笔谈”、“日朝笔谈”4章，收入论文17篇（含海外学者4篇），多为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

该书是国内外系统研究“东亚笔谈”的拓荒性著作，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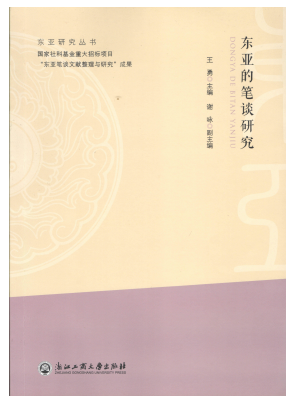
(1) 从东亚的全局观，把中日、中朝、日朝的两国间笔谈置于互为影响及关联的文化体内，凸显汉字汉文作为不同于音声语言的视觉语言，成为东亚各国千余年来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交际的主要方式；

(2) 王勇《笔谈文献的种类》、李庆《汉文笔谈之我见》，深入探讨“笔谈”这种视觉交际手段产生于隋唐之原因、存在于东亚之理由、延续千年之根据，探索笔谈作为一种新文体的理论架构；

(3) 町泉寿郎《三岛中洲的笔谈三种》、陈小法《明代中日文人笔谈之研究》、田村航《藤原惺窝与朝鲜俘虏的笔谈》、松浦章《前近代东亚海域的笔谈形态》等，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新史料，如二松学舍大学的町泉寿郎根据该校珍藏原件，全文移录了三岛中洲与清人林云达的《琼浦笔谈》、与清人张滋昉的《日清迎春笔话》，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田村航通过解读藤原惺窝与朝鲜俘虏的笔谈，确认了宋儒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史实，为探讨儒学东传日本提供了新的途径。

该书出版不久，就有日本出版社前来洽谈出版日文版事宜，目前翻译工作正在进行，期待本项目第一部研究成果能在近期推介至国际学术界。

（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組 供稿）



朝鮮通信使筆談唱和集目録 (刻本之部)

[日] 福岡大学 高橋 昌彦

朝鮮通信使唱和集リスト (版本)					
寛永十三(一六三六)年					
○朝鮮人筆語	大本	1冊	和田宗允	国会	
○朝鮮筆談集	大本	1冊	石川丈山	都立中央	
天和二(一六八二)年					
○桑韓筆語唱和集	半紙本	1冊	熊谷了庵 他	都立中央・ 東博・中野 先生	
○朝鮮人筆談 并贈答詩	半紙本	1冊	木下順庵 他	都立中央	
○東使紀事	大本	1冊	巖城山人	刈谷	
○和韓唱酬集	大本	5巻7冊		国会・柳川	柳川は後 印
正徳元(一七一)年					
○鷄林唱和集	大本	16巻1 6冊		山口	
○榎客通筒集	大本	3巻3冊	祖縁	内閣	
○坐間筆語附 江関筆談	大本	1冊	新井白石	国会	
○七家唱和集	大本	10巻1 0冊	木門	国会	
○桑韓医談	大本	3巻2冊	北尾春圃	内閣	

○日光山八景詩集	大本	1冊		福大	詩文
○問槎二種	大本	5巻5冊	秋本須溪	国会	
○両東唱和録	大本	2巻2冊		国会	
○両東唱和後録	大本	1冊		内閣	
○両東唱和続録	大本	1冊		岩国	
▽新刊 / 両東唱和録	大本	4巻4冊		ソウル大学	上記3点の後印
享保四（一七一九）年					
○藍島鼓吹	大本	1冊	小野士厚	柳川	
○客館璀璨集	半紙本	2巻1冊	木下蘭皐	内閣	
○桑韓唱酬集	大本	4巻3冊	松井良直 他	国会	
○桑韓唱酬集追加	大本	1冊	松井良直	岡山	
○桑韓唱和填篋集	大本	1 1巻1 1冊		国会	
○桑韓星槎答響	半紙本	2巻1冊	月心	内閣	
○桑韓星槎余響	半紙本	1冊	月心	東博	
○梅所詩稿	大本	2巻2冊 付1冊	唐金梅所	中野先生・狩野	
○蓬島遺珠	半紙本	2巻1冊	朝比奈玄洲	内閣	
○両関唱和集	大本	2巻2冊		内閣	
○和韓唱和集	大本	2巻2冊		国会	
延享五（寛延元・一七四八）年					
○韓館唱和編	大本	2巻1冊		柳川・狩野	
○韓客治験	大本	1冊	樋口道与	京大富士川	
○韓槎填篋集	大本	3巻2冊	合田惠	内閣	
○槎餘		1冊	淵好凱	狩野	マイクロ

○仙槎筆譚	大本	1冊	橘元勲	内閣	
○善隣風雅	大本	2巻2冊	周省	都立中央	
○善隣風雅後編	大本	2巻2冊	周省	京大	
○桑韓鏘鏗録	大本	4巻3冊		内閣	
○対麗筆語	大本	1冊	菅道伯	内閣・東博	
○長門戊辰問槎	大本	3巻3冊		萩	
○班荊問譚	大本	2巻2冊	直海龍	内閣・東博	
○林家韓館贈答	大本	2巻2冊		内閣	
○龍門先生鴻臚傾蓋集	大本	1冊	宮瀬龍門	国会	
○和韓唱和録	大本	2巻2冊	村上秀範	国会	
○和韓唱和附録	大本	1冊	村上秀範	国会	上記と刊年が異なる
○和韓筆談薰風編	大本	5巻2冊	山宮維深	内閣	
○和韓文會	大本	2巻2冊	留守友信	内閣	
宝暦十四（明和元・一七六四）年					
○河梁雅契	大本	1冊		国会	
○韓客人相筆話	大本	1冊	新山退	東博	
○観楓互詠	大本	2巻2冊		中野先生	
○鷄壇嚶鳴	大本	1冊	北山橘庵	大阪府	
○講餘獨覽	大本	1冊	南宮岳	内閣	※『日本随筆集成』四所収
○三世唱和	大本	1冊	松平君山 ほか	刈谷	※『名古屋叢書』文学編2所収
○殊服同調集	大本	1冊	林文翼	国会	
○青丘傾蓋集	大本	1冊存		中野先生	巻上のみ

◎青丘傾蓋集		写・1冊存		狩野	マイクロ。 巻下のみ ※版本写し（版本は未見）
○桑韓画家彪集	大本	1冊	小森信友	都立中央	
○桑韓筆語	大本	1冊	山田正珍	内閣	
○東渡筆談	大本	1冊	釈因静	内閣	
○東遊篇	大本	1冊	那波師曾	中野先生	
○長門癸甲問槎	大本	4巻4冊		都立中央	巻2と巻4に異なる奥付あり
○表海英華	大本	1冊	岡田新川	国会	
○賓館唱和集	大本	1冊	平俊卿	都立中央	
○問槎餘響	大本	2巻2冊	伊藤維典	内閣	
○栗斎鴻臚摭筆（栗斎探勝草に付す）	半紙本	3巻2冊	内山栗斎	都立中央	付録のみ 唱和
○両好餘話	大本	2巻2冊	奥田元継	中野先生・架蔵	
○両東鬪語	大本	2巻2冊	松本良庵	内閣	
○倭韓医談	大本	3巻1冊	坂上善之	内閣	
○和韓医話	大本	2巻1冊	山口忠居	内閣	
○和韓雙鳴集	大本	6巻5冊		九大	
文化八（一八一）年					
○鷄林情盟	大本	1冊	三宅威如齋	中野先生	